
上海都市民俗：行进在时尚与传统之间

程 蔷

〈上海大学〉

摘 要

上海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际大都市。近二十年来，其经济发展很快，文化生态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出现了不少新的民俗风尚。本文对上海新民俗的某些方面进行考察与研究，以上海居民结构因素的变化为立论基础，以上海都市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尚问题与传统的关系为切入点和主要视角，从居住形态、信仰方式和节日、婚俗等方面，对上海新民俗的形成、表现和性质做出描述和论析，论证了上海都市民俗富于创新性、开放性和多元互补性，在时尚与传统的张力下不断演进的特色。

关键词 时尚、传统新民俗、文化生态、开放与多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经济、文化发展迅速，无数高楼拔地而起，众多外资公司来此安家落户，中外移民日益增多，社会生活节奏也变得更快，上海正全面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迈进。上海人的生活和上海地方文化，也悄悄地发生着种种变化，种种新的都市民俗正在形成之中。

作为当今中国民俗文化的典型之一，上海都市民俗的重要特色是时尚与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今正在形成的上海都市新民俗，可以说是行进在时尚与传统之间。

追逐时尚，本是上海民俗和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追逐时尚在上海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民俗，一个人如果甘于陈旧，不向往时髦，倒有点不像上海人了^①。时尚的基本内涵是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上追新逐异，而其特点则是喜新厌旧、变化快捷，因此往往是与一代一代年轻人联系在一起。时尚往往受外界影响而飙起，故越是开放之地时尚越多，演变越速。时尚如潮，有涨有退，故时尚会转移，会消失，但有时也会沉淀。一时之尚若能渐渐地或部分地沉淀于文化中，虽后来的青年已不再追随，它却就变成了一种传统，新的传统。可见，时尚与传统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我们在这里讲时尚与传统，是从当下出发，也总是心存着明确的时间概念。

时尚多变，传统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就上海而言，有1949年以来形成的传统，有1843年开埠以来形成的传统，有元明清时代古上海的传统，乃至更古老的吴越文化与华夏文化的传统等等^②。本文所谓的传统并不是指上述种种中的某一种，而是与“时尚”相对的一个笼统概念，如果说时尚是指“眼前怎样”，那么，传统即指“从前是怎样的”。我们关注的是时尚，是正在变化和形成中的新民俗，之所以要谈到传统，是为了用传统所代表的旧民俗与时尚比较，从而使时尚更为鲜明凸出。传统悠久而多样，但在本文中一般说来，能够用近时的传统相比，就不去翻更老的账本了。

正在形成之中的上海新民俗，范围太广，内容太丰富，本文只能选择几个方面作举例式的说明。

我们将首先从上海居民结构的变化谈起，因为民俗的内涵是人的生活，人是民俗发生和变化的基

^① 此点几乎是中外学者之共识。亦有学者在著作中加以阐述，如蔡丰明谓上海都市民俗特征，除兼收并蓄外，有“趋新善变”与“崇尚洋派”两条，便均与此有关。见蔡著《上海都市民俗》，30-3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关于上海历史与文化传统，主要依据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础。上海民俗由上海人创造，上海民俗的种种新变，与上海居民结构的变化关系很大。

具体的，我们拟从三个方面展示上海都市民俗。一是居住形态；二是信仰方式；三是节日和婚俗。每一个方面又都有所侧重，居住形态主要涉及住房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各种人的心态；信仰方式主要围绕着上海的寺庙及与其有关的活动展开；至于节日，名目甚多，不能都讲，拟以传统色彩最浓的春节（过年）为主，婚姻嫁娶花样也多，拟对新兴的婚庆礼仪和主持此礼仪的婚庆公司作一些分析。对于丰富多采的上海民俗生活，以上所论，当然只是略窥一隅，挂一漏万而已。限于篇幅，只能如此。文章的结论归结到上海文化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和开放性——上海从来就是一个海纳百川而又充满创新精神的都市，历史上的上海如此，今日之上海尤其如此，上海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共同为新民俗的创造而努力。

I 上海居民结构中的新因素与都市新民俗之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上海城市人口增长加速。据“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所发布的资料，到2005年底，上海人口总共1921.35万，其中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占70%，常住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占23%，还有一些是临时居住、流动性更大的外来人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近五年来，上海外来人口的增幅是平均每年27.8万^①。应该说，这个增幅是不小的。这说明，这些年来，上海开放的程度更大了。陆续进入上海的新人口，主要成份是各地来沪求职务工者，各国来沪经商任职者，在上海读书毕业后留沪深造或工作者，还有本从上海外出去求学或工作而重新回归上海者，上海都市民俗中的时尚之风，与居民结构中外来成份的增加有着很大关系。

这里有一对概念必须先予说明与讨论。这对概念就是所谓“老上海”与“新移民”。

老上海指的是居住上海有年、早有上海户口的本地居民。新移民指近年才来到上海工作或求职，因而居留于上海的人，他们中有的已拥有上海户口，有的还未有，但也按新制度领取了居住证（以前称临时户口，但今与之不尽相同）。中国的户口制度一向很严，改革开放以来，虽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已开始松动和灵活，对于新移民来说，户口已不是压在他们心头的最大问题。

简单说来，现在的上海，主要就是由所谓老上海和新移民这两部分人组成的。而上海都市民俗中时尚与传统的矛盾和抗衡也主要发生在这两种人之间。新移民到上海未久，当然首先需要融入上海文化，可是他们对上海的民俗传统（或者说地方风俗）也许并不熟悉，要融入就得有个学习适应的过程。幸好上海传统民俗中本有属于中国人全民的东西（比如某些民俗节日），对此，新移民自然也是认同的，早已具备的。他们要下功夫学习的只是上海风俗中某些比较独特之处（比如上海人待人接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般准则）。同时，新移民也必然带来很多自己的风俗习惯，并在一定条件下对上海人（尤其是敏感的年轻人）发生影响作用。不过新移民队伍庞大，成份复杂，他们也不是全都代表着新风气和新时尚，真正代表时尚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老上海亦非全属传统，在上海长大的大量年轻人，与外来的、代表时尚的新移民，在崇尚新风、改变和冲击传统方面，是相当一致的，甚至是沆瀣一气的。事实上，那些在上海长大的年轻人，其父母或祖父一代本来也往往并非上海人，而是从外地迁来的，所以这些上海青年，从根本上说，很多乃是移民的后代。上海本是个移民城市，真正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以往常被称为“浦东人”，而生活在黄浦江以西、以上海人自居的，倒多半是外地移民——只是移来上海的时间有早有晚，有长有短而已。

由上所述可知，老上海和新移民是我们在论析上海都市民俗时免不了要用上的一对对应概念，但又只能是模糊地、大而化之地使用，而不宜绝对化。老上海与新移民二者既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新又

^① 这里的一些数字据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2006年4月6日发布之《2005年上海人口概况》。

可向老转化，他们在上海都市民俗的继承弘扬、变化发展上，既各有各的作用，又能够有所认同，形成合力，从而各献所长，缺一不可^①。上海都市民俗正是历代新旧移民所共同创造出来的，1843年开埠以来至今的情况是如此，从今往后也将是如此。

然而，把上海人口分为老上海和新移民实在是太粗疏的分法，藉以分析上海都市民俗的新变也显得很无力。要谈上海人口结构对都市民俗的影响，还需要从另外角度进行分析，即从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来看上海人。

从中国当代城市居民所从事的职业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状况，可将他们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各类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无业失业者阶层等等^②。这种划分的依据，当然是针对全国的情况，但对上海来说，也颇适用。这里与都市时尚关系最为密切的，应是人数众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服务人员阶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外籍人员），以及目前尚在校学习、不久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未来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白领们。对于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时尚，这批人往往最为敏感，反应最快，他们也最能造成一时的潮流和风气。

谈到时尚的制造和推动，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个概念，那就是中产阶级，因为活跃于都市之时尚，多与日常生活相关，也多与生活比较优裕的中产阶级相关，种种时尚常常就是这个阶层中某些人制造出来并推广开来的。

中产阶级本是一个以经济状况为准划分出来的模糊概念，上述专业技术人员，如艺术家、明星、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媒体出版工作者、大中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等等，虽然各自的经济收入有所不同，但大抵均属此类；某些办事和服务人员，像各级经理、一定职级的公务员、银行或公司职员，所谓白领或高级白领，也应属于此类。他们的月收入比较高，可从五、六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但总是已在小康水平线以上，个人可拥有不错的住房，拥有私人小车，并在银行或股市里拥有相当的存款与资金，等等。时尚的制造、推行和追随，无论落实于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哪个方面，都是需要一定经济能力支撑的，而这些人则有足够的条件来紧跟，甚至引领时尚。

上海现在有许多流行的消闲杂志、时尚杂志、女性杂志，其预期读者主要就是这些人。这些刊物印制考究，资讯丰富，图文并茂或根本就图片为主，内容多为服饰、化妆、汽车、住房的推荐介绍，也包括旅游、健身、演出、饮食、礼品和白领人际交往，特别是男女交往的种种情事与心态的短文等等。还有许多公司和集团，为扩大影响，凝聚人气，有利于长线发展，干脆自己创办内部刊物，号称“企业内刊”，免费赠阅，同时利用会所办起会员制的俱乐部等等。其读者和会员征集对象就主要是年轻的白领阶层男女。应该说，目前上海社会的主要时尚，就是由这些白领们代表或左右着的。我们观察上海的都市民俗的新变，不能不特别关注这个阶层行为和心理的动向。

II 上海居住形态及其民俗涵义

上海近年来最大最明显的变化，是众多大楼拔地而起。这其中很多是办公楼，但更多的是住宅楼。与上海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上海的住宅建设几十年来欠账太多，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大力发展住宅楼是

^① 关于老上海与新移民的关系，曾引起公众讨论，常有相关文章见诸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及其周刊上，如2006年3月至5月，《新民晚报》就曾讨论过“上海是不是我的家”，提出过“新移民共筑上海文化”等命题。全国其他报刊和网络文章也不乏上海人、上海精神、海派文化等话题。

^②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析，曾有不少文章谈及。此处请参上海《文汇报》2001年12月13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课题的报道。该文述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分类，其中涉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另将私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列为两类，本文略作归并。

很必要的，很受市民们欢迎。由于住宅建设的发展，上海人的居住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其影响随即渗透到上海都市民俗之中，有关居住的老传统与新时尚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纠葛，时尚促使传统变异的进程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这是一个观察上海都市新民俗的良好角度。

我们不妨从上海人的传统居住形态和与之相关的民俗习惯（传统）说起。

上海传统居住形态向来多样，与居住相关的民俗内容也很丰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市民住房条件得到改善之前的情况大致如下：

最能代表老上海的，也许还是所谓石库门里弄。这种兴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筑样式，在1949年以后已停止发展，历经几十年，已经显得颇为陈旧。特别是因为种种缘故，原本一家一户独住的形态，往往已变为数户人家合住，今日石库门里弄之拥挤杂乱，早非初创期之整洁有序可比。

旧式公寓洋房，也是老上海一种重要居住形态。这种公寓大都是西式高楼，内部设备较为现代，在早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属于较高档的居处。但后来的问题也与石库门里弄一样，由于居民的不断繁衍增添而变得拥挤而杂乱，而且这种公寓多数已有六、七十年以上的历史，本身也难免陈旧了。

比公寓洋房更高档次的是独立的花园洋房，这种洋房往往座落在昔日的租界地区，占地较大，主楼二三层，有若干附属建筑，房舍周围有一片绿地或花园，环境优雅，闹中取静，堪称老上海的一大特色。1949年以前，此类住宅是沪上豪富或外国人所住。1949年以后，不少这样的小洋房被征用，成为机关单位办公场所，不再是私家住宅，但仍有一部分历经文革其产权仍属私人，成为今日上海最引人注目、最昂贵的房产。

上海为数众多的普通市民是住在一种所谓新工房的“某某新村”之中。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新村陆续在建，至今未歇。由于建设年代不同，它们的规模和设备不等，一般说来是晚建者质量较好较现代。

上海最差的住房是棚户或滚地龙。顾名思义，棚户已非正式建筑，往往用废旧或零散建材简易搭成，聊以遮风避雨而已。滚地龙则更差，往往在废弃工地用塑料和硬纸等临时搭建，随时可以搬移，不像棚户尚有一些砖瓦木柱，地点相对固定，甚至能够连片形成小区。此类住房多由来沪不久、尚无正式工作的人或家庭居住，他们多以打短工或捡废品方式谋生。1949年后，政府投入大力，拆除了许多这样的住房，改建为新村。但近年来涌入上海的外来人口，新的棚户与滚地龙仍在不断产生^①。

与上述情况相关，上海人居住方面的民俗也呈现为多种形态。这些民俗有的已成为传统，深深地渗入上海人的心灵，成为上海人的集体无意识，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文化心理。而随着近年的住房条件改善，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要求，不妨称为时尚，它们与传统常常发生矛盾，形成张力。

总的来说，近二十年来，上海人的住房条件是颇有改善的。现在上海居民住房样式比以前更多，除石库门，公寓洋房、花园洋房、新工房外，又多了新型小区，其中既有多层建筑（六层，无电梯），亦有高层和小高层建筑（七层至十七八层乃至三十多层，有电梯）、连体别墅或独家别墅，等等。旧的棚户区和滚地龙不断被改造，新的出现了，再被改造，这个过程也从未停止。如以上海常住人口计，人均居住面积也有较快的增长。

比较能够代表上海人住房观念的，当然还是新老上海人中的中产阶层。他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既有维持传统的一面，也有反映时尚的一面，实际上相当程度地影响着房地产业开发走向。这种要求

^① 以上叙述依据笔者对上海民居的实际了解。读者亦可参其他资料，如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第一篇《城市建筑园林》中“住宅建筑”一节。见该书54-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如杨嘉佑《石库门房子和上海人生活习俗的演变》，刊于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印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民俗文化》论文集，218-227页。2001。

首先是针对房屋本身的，其特点是对房屋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例如房间朝向应该以朝南为主，这样阳光照射好，上海冬天往往阴冷，阳光显得十分宝贵（所以在上海，朝南的房子很紧俏，人们买房必定会问：其中几间是朝南的）。其次是面积较大，间数较多，得房率高，有较好的性价比。这些问题都需要房产商在设计阶段就予以解决。再次是煤气和卫生设备独用（此问题现已解决，但这要求显示人们对以前“煤卫合用”的反感），要有一个以上的卫生间和洗澡设备（在八十年代以前，市民洗澡曾是件麻烦事），以及房屋周围要有较好的绿化和方便的服务设施，等等。

如果说上述种种体现的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普遍需求，那么，对于住房所属地区（俗称“地段”）的要求，就是颇具上海人思维特色的了。

上海市区历来有老城区与租界之别。老城区，又叫老城厢，是上海市区的发源地，后来亦称南市，街道比较隘窄，住房比较老旧，人口密度较高。故上海人多愿住于租界。租界又有英美租界、日租界、法租界之别，英美租界多在黄浦区、静安区，属于闹市；日租界主要在虹口、闸北，地区偏北。法租界主要在徐汇区，被认为是最高雅的住宅区。后来，这种观念泛化为“上只角”与“下只角”之别，徐汇、静安、黄浦等区为上只角，杨浦、普陀、南市（现并入黄浦区）等为下只角，至于广大郊区自然比下只角更不如。在上海人心理中，居住于下只角者往往表示羡慕上只角，故居住在上只角者往往就有一种优越感。

浦东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前，当然属于下只角，它的城市化程度远不及浦西，而与浦西的交通全靠轮渡，确实不方便，故在上海民俗中曾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随着浦东新区建设的发展，这一观念已发生重大变化。浦东新建了许多外资公司和银行，成为许多新上海人上班的地方，又建设了大量配套设施、高层居民楼，街道规划也是全新的，给人非常现代化的感觉，很多白领男女为了上班方便，都愿就近买房或租房，浦东的房价自然也就扶摇直上。新上海人对浦东的青睐，可以说正在形成一种选择住房地段的新时尚。

上海人将居住地点分上下好坏的档次（即使口中不说，心里都很明白），是有传统的。这传统在新条件下有所变异，如视浦东为下只角的观念显然已变，但也有保持传统的一面，如对开发得较晚的杨浦、普陀等区和更远的郊区，评价依然较低，而以人民广场为市中心，以市中心为圆心，距离越远的被认为越差，这样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变，这在房价的高低和房产供求关系上仍可鲜明看出。这很能说明传统的力量，要改变它，不是一日之功。

近年上海为改善道路交通建设了环线，以中山路为基础的一圈，叫内环线。在远郊虹桥、莘庄、嘉定以外有外环线，内外环线之间，又建了一条中环线。三条环线将大上海划分为三个层次，越往外距市中心越远。于是，人们又很自然地以环线为区分居处价值和地位的依据，内环线内是老市区，老洋房多在这里，被认为是最高档；内外环之间次之，外环之外当然就是下只角了。此种区别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房价，也影响居民的心态。许多本来居住在市中心，因拆迁而搬到内环外乃至外环外的老上海人，心情颇难平静。现在的上海又流传一句民谚，道是“市心里讲外国话，内环线里讲普通话，外环线里讲上海话。”这句民谚的意思很复杂，第一层意思说的是居住情况，许多外国公司和办事处等开设在市中心，市中心不少老洋房和新的高级住宅租售给在沪工作的外国人居住，总之，市中心外国人多，所以外语比较通行。而大量的上海老住户因房屋拆迁而搬到郊区，自然也就把上海话带了过去。第二层意思涉及目前上海的职业分配状况，在市中心和内环线里许多单位上班的，已是外国人和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特别是许多外地人在上海开办公司或企业，大量上海人则受雇于外国或外地老板，这些地方当然需要讲英语或普通话。上海话退居次要地位，与上海本地人在职场和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的趋势（这趋势究竟有多严重值得认真研究），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上述民谚实际上反映了上海部分敏感的居民对这种情景深感惶恐忧虑的复杂心态。然而如果不是站在老上海的立场，

而是宏观地看，那么，新移民在上海不但人数迅速增多，而且地位日渐重要，上海呈现出一种态势，即它不仅是上海人的上海，而且是全国人才乃至全世界人才的上海，上海的大门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打开着，这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必需具备的条件和品质。

通过有关居住的民俗事象，我们看到了上海人的心理，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上海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的步伐。与居住有关的事象还有很多，均可由之窥见上海都市民俗在传统与时尚的张力中演变的情况。下面再举一些实例来谈。

由于居住条件的改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非常普遍的几代同堂、几户一室的情况逐步缓解，随之而来的是小家庭越来越多，特别是独生子女的三口之家增多；以及单门独户的单元式（公寓式）住房增多，新建的商品房，大都是这种样式。而住房形态的变化，带来的是家庭观念以老辈为中心向以独生子女为中心的转变，旧式的三代、四代同堂家庭，在上海已经越来越少。同时，原先“抬头不见低头见”、矛盾虽多但比较亲密的邻里关系，现在也被同住一座大楼却很少往来的淡漠关系所代替。这种在发达国家早已出现的城市病，在上海也已很普遍。虽然如此，目前上海人对于居住条件的时尚观念，仍然是倾向于单门独户为主，小家庭为主，多数人仍然向往清静幽独而并不以与邻里隔绝为意。

上海的家庭，在前二十年中如有孩子要结婚（特别是娶媳妇），由于无法增加住房，一般只能在原有住房内作些调整，如将较整洁的一间让给孩子充当新房之类。如果条件实在困难，甚至可以采取将原住房简单隔开的办法来解决。那时的新郎新娘虽然也渴望有自己独立的新房，但知道条件不允许，也就不会过于勉强。现在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将要新婚者首先考虑的是置办新房，女方尤其重视这一点，这已成为上海人谈婚论嫁的先决条件。按上海的风俗传统，准备新房的事务主要落在男方，无论婚后是否与男方家人同住，男方之家必须为新婚者准备新房，嫁娶关系依然十分清楚，传统如此，时尚依然，这一点并未变化，变化的只是青年男女对住房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上海有儿子的父母因旧习未除而需要未雨绸缪，在沪工作的单身男子为了结婚，则需用先交首付款，借贷按揭，分若干年加息还清的办法解决住房问题，也就因此背上较重的经济负担（一种新的说法是沦为“房奴”）。这里比较理想的办法是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但是，不肯承担此种负担，以必须拥有住房而无需还贷（简称“有房无贷”）为择偶先决条件的上海女青年却是大量的，所以也有一些男青年因此无法结婚。

上面说到，三代同住的情况现在已越来越少，倘若仍有一些，多数是由于该家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中国的老人多数都非常乐意这样做，上海老人自不例外。但三代同住之家在居室的使用与分配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反映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的某些变化。中国以前是一个以老人为家庭中心的社会，至少在理论上，老人在家中地位最高，要得到下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孝顺。如果三代同住，一般是将最好的那一室（比如朝南或较宽敞）让老人居住，现在情况不同，总趋势是老人会将最好的那一室让给第二代或第三代居住，老人自己则住在稍差或最差的那一室，若已丧偶，更一定是住于最小的一室。上海流传着这样的民谚：“穿儿子的，吃孙子的。”这话的表面意思是：由儿子提供衣服，由孙子提供食品，这是一个老人“有福气”的标志。但实际上这句话的含意却是：穿儿子所不想再穿的旧衣服，吃孙子吃剩下的任何东西。这是对某种心甘情愿为子孙做马牛的老人的描述。这一描述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的真实。三代同堂而将条件最好的一室让第三代居住，是与上述民谚所反映的实质相一致的。

居住状态的变化，带来了人际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传统民俗的变化。这种人际关系不仅在家庭以内，也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上。比如，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装修问题日益突出。新房子要装修，因为房产商提供的多是所谓毛坯房，只有一个大框架，细部完全是空白，不进一步装修就没法入住。旧房子有的也需要装修，如在厨房、卫生设施方面作一些改进，或铺上地板，重新粉刷之类。而为了装修，就不能不与负责装修的公司或工人打交道，产生一些新的人际关系。

早几年上海人习惯于找熟人介绍装修队负责此事，近几年更多的是委托装修公司进行。由于政府和消费者协会的干预，装修公司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事前双方订立相当周详的合同，事后也有较好的验收和保修。因此，由装修公司承包，已成为当下上海家庭装修的时尚，而力量单薄的私人装修队已渐渐被挤向边缘，至于零散的工人，如泥水工、油漆工之类，就更不易接到活计了。据说有些私人装修队和零工已被公司收编，成为这些公司旗下的人员，改以某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而上海现有的装修公司，数量十分可观，并开始涌现出一些有名品牌。考察在上海从事装修劳动的队伍，专业的工人其实很少，其成员多数来自外地的农村，本是农民或乡村工匠。但因现在长年留沪工作，有的已将妻子和小孩从乡下带来，妻子从事各种女工（如做保姆或钟点工），小孩到了入学年龄就在上海上学，实际上他们也成了新上海人的一部分。

也有房产商试行全装修的服务方式，即把新房子按一定规格装修好以后再出卖，这样可免除买主自己找人装修的种种麻烦。这种方式受到一部分白领阶层的欢迎。但价格高，装修质量和样式未能尽如人意，又使此方式行之维艰，难以推广。至今接受此种服务方式，仍要算是时尚做法。有的装修公司推出“全托式装修”业务，即自谈妥装修方案后，一切交给公司办理，房主可免装修过程中一切琐碎事务的麻烦，只等装修完成入住即可。这样的方式收费自然较高，公司是否言而有信更是十分关键，对于处处精打细算、最怕上当的上海人来说，接受它尚需时日。

房地产业发达，买房者日多，带来了装修业的繁荣，也给装修者带来许多烦恼。装修收费和建材挑选中的陷阱，装修质量的含糊以及种种小纠葛，几乎贯穿过程始终，令房主防不胜防。装修业的诚信至今仍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房主与装修业者的矛盾。此外，一幢大楼里，陆续入住的人家陆续进行装修，先装毕、先入住的人家，就得忍受后装修者发出的电钻声、敲打声，又常常会引起邻里纠纷。这也是由住房问题导致人际关系矛盾的一例。至于业主与物业管理者的矛盾，诸如服务质量高低、维修基金使用合理与否、业主权益如何得到保证等，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矛盾，也必将对上海都市民俗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住房改善了，房内的设施和家俱自然也会讲究起来，中国和上海的家用电器业因此大为发展。上海民用家俱也朝现代化方向新变，同时在上海都市民俗上亦有深刻反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上海曾风行过打家俱的时尚，就是需要家俱者延请木工师傅来家打造，那时的新婚者对家俱有“三十二条腿”“四十八条腿”的要求，而现在这些已成为过时的老传统，差不多快要忘却了。如今的青年人安家，除买新房外，就是购买新家俱。而且买家俱本身也有时尚非时尚之别，各大家俱店竞相推出新款的、高档的家俱，但大概要算到瑞典人开设的“宜家家居”选购最为时尚了。“宜家家居”在北京、上海都开设了面积很大的商场，其经营方式比较现代，场内物品由顾客自选自取，犹如超市，所供货物包括建设一个新家必需的一切物件，从大型家俱卧床、沙发到居室、卧房、客厅、厨房、浴室、婴儿房一应软硬用品，包括种种装饰用的小摆设，几乎无所不有，而且比较新式和西化，表现了易装易拆、简洁、环保等时尚观念，故受到现代青年（甚至年纪更小的少年儿童）的广泛欢迎。

房产业发展，住房条件改善，带来许多新鲜变化，多数属于可喜的事，但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可忧之事。上面提到过业主与物业管理者，与装修公司的种种纠葛，就是很麻烦的社会问题。更令人忧虑的是日渐增多的破坏亲情、冲击伦理底线的房屋遗产官司。打开电视，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此类案件的报道，有兄弟姐妹为房屋遗产反目闹上法庭的，有父母（特别是年老丧偶者）为住房起诉子女或孙辈的，有伪立遗嘱的，也有立了遗嘱又反悔变更而引起纠纷的，关键大都有关房产的利益分配。有的旧房本来不值钱，一家子女并未对此抱有多大期望，但情况一变，拆迁补偿成倍增长，旧屋价值大大提高，这些子女反而因为分配不均而争执不下，甚至闹到对簿公堂。为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亲情和伦理道德都受到巨大冲击。维系社会和家庭稳定、以温情脉脉为特色的老传统，被冷酷的重利轻义、

“亲兄弟明算账”的新时尚所挤压，所代替。房产官司往往利益得失较大，所以围绕着它，都市民俗的这种变化表现得最为凸出。

上海都市民俗与居住形态有关的种种方面，还有很多可讲，限于篇幅，暂时就讲到这里。

III 上海人的信仰崇拜及寺庙活动

下面要说的，是上海人有关信仰和崇拜的风俗，这也是都市民俗的重要方面。

上海人的信仰与崇拜，与其人口构成的复杂性相一致，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状态，世界上几大宗教，在上海几乎都有信仰者。当然最主要并为人们所熟悉的还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本土化的佛教、道教。也有一些更具地方色彩或民族色彩的宗教信仰与崇拜，随着外来人口的迁移，自然也进入上海，只是范围不大，影响有限而已^①。

比较起来，与上海都市民俗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已成本土宗教的佛教。活跃在上海的商人、企业家和广大普通市民，包括许多年轻的白领和外来人口，大抵还是与佛教渊源更深。因此，上海虽然也有基督教、天主教和清真寺的礼拜堂，也有道观，但更为热闹，香火更旺，也最能表现上海民俗和上海人文化心理的，还是大大小小的佛寺。

上海著名寺庙不少，其中历史久而声名远扬的，如老城隍庙、静安寺、玉佛寺、龙华寺等等。一方面，它们继续发挥着传统功能：祭祀、祈福、消灾、还愿，接受布施和捐赠等等。寺庙僧人们依靠这些经济收入，生活明显改善。于是另一方面，出家为僧在当今也成了一种生活出路，尽管当和尚不会毫无戒律，但并不妨碍他们过上相当现代化的生活。

上海市民从来就有烧香拜佛、祈求保佑的习惯，此传统由来已久，只是1949年以后受到压抑，至文革期间，公开的此类活动近乎绝迹。但留存于民众心中的迷信观念实际上远未根除，一旦外力消失，又受市场经济追逐利润和财富风气的猛烈刺激，各类迷信活动，从拆字打卦、看相算命到烧香拜佛，无不死灰复燃。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过年过节时各寺庙烧香拜佛可谓盛况空前，且有日趋炽热之势。尤其是在旧传统之上，又翻出了一些新花样，一连几年热衷不懈者有增无已，跟风追随者大批涌现，竟显出了一股形成新风俗的苗头。如除夕夜或大年初一到龙华寺、玉佛寺抢烧头香，捐钱撞钟，以为可保生意兴隆、万事如意，于是届时两庙人潮如涌，拥挤不堪。由于想抢烧头香的人太多，庙前争夺过于激烈，于是入庙便要买票；然而一票难求，导致“黄牛”倒卖垄断，票价飞涨，几十元一张的普通票变成数百元一张的“黑市票”。正月初五是民间迎财神的的日子，前一夜直至初五清晨，上海全城都会爆竹声不断，而二庙前则再次人流潮涌，烧香撞钟者蜂拥而至，交通与安全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②。

不要以为积极参与此类活动的都是上年纪的上海人，事实上，年轻人，无论是白领或商人，也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都有这方面的狂热者。到龙华寺、玉佛寺烧头香，撞钟，与其说是一种传统，不如说是一种时尚，也可说是传统与时尚熔结而成的新民俗。

寺庙僧侣的日常活动是念经、做佛事，放焰口，做水陆道场，祭奠和超度亡灵以安慰死者家属。每个寺庙都对这类活动明码标价，按佛事繁复的程度收取数量不等的费用，也接受善男信女的捐赠和布施，代他们祈求实现愿望，禳福避灾。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也不是只与上年纪者有关，很多年轻人也十分热衷。他们或求财运，或求佳偶，或求美职，或求升学，或求考试成绩优秀等等，不一而足，总之都将个人欲望寄托于神佛保佑之上。他们并不是真信佛教，也根本不懂佛教，对佛教经论更不是不

^① 此处可参陈伯海主编《上海文化通史》第十一篇《宗教》，1103-11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② 程蔷对此曾做过介绍分析，见其论文《“过年”：从传统到现代——并略及中日过年习俗异同的比较》，日本名古屋大学GSID Discussion Paper No. 128，2004年12月。

感兴趣，他们之走进佛寺，一是为自身欲念所驱使，一是为普遍的民俗所裹挟——大家都如此，我又何能例外？这便是众多入庙烧香拜佛者的心态。近年来祈求者队伍中甚至出现中、小学生，而所求之事多与学习或考试成绩有关。这种现象既是民俗的自然蔓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教育和考试制度所造成的压力之重。当人们拥有自己的欲望与期待，但又无力把握命运和保证实现目标时，就会把希望寄托于冥冥中虚无飘渺的神灵。而世上的事确实有许多是主观之力无法控制的，人的命运并不总在自己掌控之中，这正是宗教与迷信不但必然诞生，必然形成一种传统，而且在新条件下会转化为时尚的根本原因。

当然，传统也在变。寺庙除作为市民表达信仰和崇拜之情的地方，它的功能也在扩大着。这种功能扩大缘于人们除了需要崇拜与信仰之外，还需要享乐和消费的内在要求，也与商家为牟利而开展各种宣传的外在刺激有关。当然，寺庙功能扩大的过程并非始于今日，不过是于今为烈而已^①。上述诸寺庙，在继续其宗教活动的同时，也以一个个旅游景点的面貌出现。龙华寺、玉佛寺、静安寺，特别是老城隍庙，既接受烧香拜佛，也接待各地来沪的游客。老城隍庙更与著名的豫园和豫园商场毗邻，那里有工艺品市场、小商品市场，有民俗文化展览、商贸集市中心和大量风味饮食店。而龙华寺利用其地理优势，一年数次举办庙会，不但成为上海一景，也成为上海人喜爱的盛大节日。人们来到这里，不完全是，甚至完全不是为了向神佛祈求和祷祝，而根本就是为了游玩、观光、休闲和品尝美食。在旅游中进庙烧一炷香，磕几个头，或捐一些钱，并不一定有明确目的，有时是好玩，有时为随喜，算不得什么迷信活动，只能算是一种具有传统色彩的民俗文化节目，或者也不妨说是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尚活动而已。寺庙功能在传统与时尚互动所形成的张力中有所增加，既是上海都市民俗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上海都市民俗的新变。

IV 上海人的过年和结婚

岁时节日是观察民情风俗一扇极好的窗口。上海一年的节日很多，大致可分几个系统。

一是国家法定节日系统：元旦、五一、十一，这是通常所说的三个长假。还有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九月教师节等等，都是带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节日。

二是民俗节日系统，现在较受重视的是阴历年（从送灶到元宵的二十来天，亦称春节），清明节（扫墓踏青），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本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现多在此前后下葬扫墓）。属于此类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节日，如四月八日佛诞，七月十五中元等等。

三是外来节日，像圣诞节，复活节，情人节，愚人节等等。这些节日的引进与外国人、海归派（留学归来者）的增多有关，也与上海市民，特别是白领阶层追逐时尚之风有关。近几年来，此类节日的声势规模在商家的大肆煽动和推波助澜下日益壮大，这是外来文化渗入的一个标志。

四是一些新增节日，如母亲节，父亲节等等。还有人提议，把某些传统节日改造为新的民俗节，如有人建议把农历三月三定为女儿节，把农历七月七（七夕）定为中国的情人节之类，但尚未获得认同、批准。

上海人的节日虽多，但所有这些节日中全民最一致地投入，也得到国家、政府充分重视的仍是传统节日过年（春节）。

过年是一件民俗大事。首先，它的时间长，在法定假期七天（从正月初一到初七）之外，尚有大大的通融余地。实际上，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四的送灶起，到农历正月十五至十八的元宵，统统都

^① 寺庙功能走向多样，寺庙与文化娱乐、与集市贸易等等发生瓜葛，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人们在宗教、祭祀、扫墓、纪念先人的活动中掺入游艺休闲和娱乐成份，也是古来如此。请参程蔷、董乃斌合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之《岁时节日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应算在过年这个大节里面。从送灶、除夕到元旦和元宵，这是一个民俗节日的组合，其间高潮迭起，精彩不断，虽然法定假期只是七天，但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略作调整（所谓“调休”）即可将别的假日（如周六、周日）集中过来，多的可达十天左右，至于此时正值学校放寒假，学生教师就更自由些。因为假期长，相关活动和节目就多。这段时间家家需要置办年货（这是传统），需要安排年夜饭（年夜饭在饭店聚餐是新风尚），还需要外出游玩或观赏文艺演出，节日经济呈现格外繁荣的景象。

其次，过年也是处理上海人与外地人、老上海与新移民关系的重要时刻。一部分上海人过年会外出旅游，总的来说多数仍是留沪过节。外地人和新移民则不同，他们中一部分会留沪过节，但多数仍要返乡省亲，节后再回来务工。春节运输之大忙，便由此而来。政府对节日的重视、对人民的关怀也正通过交通运输的良好安排加以体现。大部分打工者回家探亲了，留沪过节者便会显得寂寞孤单，此时，上海人给予他们较多较好的照顾，会使他们倍感温暖。近几年来，上海市和各区、各街道都有意识地这样做，也几乎要形成一种新的良好风尚。

上海的过年就是如此，一方面有传统的继承，如年前大扫除（掸檐尘）全面搞一次清洁卫生，如年节期间亲朋好友、同学同事相互走访拜年，话旧慰问；一方面有时尚的流行，如在家吃年夜饭改为到饭店聚餐，单纯守岁改为欣赏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单纯在家休息改为外出旅游等等。也有一些风俗处于新旧相争与交替之中，尚未定局，传统与时尚都有所表现。如放鞭炮烟花，是一种老传统，但弊端严重，害多利少，曾遭禁止和限制；拥护禁放令而主张用更文明环保和安全安静的方式来过年的，则不妨称为时尚。但去年部分民众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下大力吁请，说过年不放鞭炮就没有“年味”，就失去传统了，于是规定开始松动，变“禁”为“限”，即允许有条件、有限制地燃放。今后究竟会如何，还在变动之中。

总的说来，上海的过年是传统未断，新俗不少，过年习俗正处于新旧习俗的较量和融合之中。但其根本趋势是健康的，不像有些民俗节日（如中秋节），在过度的商业操作下已远离传统的文化涵义，蜕变为竞相制作、出售高价月饼以牟取暴利，假馈赠月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恶俗活动。这种民俗变质现象虽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但要扭转并不容易。相反，今年端午节竟有商家模仿中秋做法，制作和出售天价粽子，使一个激励民族精神的良好节日走上庸俗的商业之路。坚持优秀传统，创造健康时尚，而抵制拜金主义、唯利是图庸俗低下的商业操作，对于上海都市民俗的建设来说，还需要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如果说过年是全民性的一年大事，那么，婚姻应该说是个人一生的大事。婚姻习俗中传统与时尚的抗衡与融会，是上海都市民俗中很值得的关注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青少年性成熟期提前，中学生早恋现象颇多；另一方面却是不少大龄青年对婚姻恐惧，不愿成家，宁可不婚而同居。这种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已出现的现代城市病，上海也存在着。在青年人的婚姻问题上，高学历女子的困境，更为突出，她们常常落到别人不敢问津、自己又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以致年岁渐老，青春蹉跎。于是，现在渐成风气的是，不少家长或女青年本人，在学业深造和结婚成家两者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后者。许多家长对于儿女老大不婚非常着急，甚至越俎代庖、事倍功半地帮他们去“相亲”。结果在某些场合，只见父母们之间积极地谈婚论嫁，而作为主角的儿女却不但不登场，有时还会怪罪父母。这种情形在上海竟也算得是时尚一景。

父母一辈与儿女在婚嫁问题的分歧，有很多方面。即使已经一切谈妥，要举办婚礼了，父母代表的传统和儿女喜欢的时尚，还是矛盾重重。对于婚礼，当事人多数愿意从简（如以外出旅行代替婚礼和请客），而长辈（尤其是父母）则多数要求一定礼数，在饭店摆开几桌到几十桌不等的婚宴，以使婚姻名正言顺，影响深远。虽然我们未作统计，但从上海婚庆公司的繁荣和预订婚宴的提前量，可以

推知最后恐怕还是按家长意见办的多，多数新人不得不操办婚礼。其实，家长们往往会因此背上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男方家长尤其如此，但家长们似乎大多宁可自己平日节俭，而把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一些，体面一些。在这里，我们再次感受到传统的威力。在这方面，女方家长稍有不同，新房无需他们准备，婚宴也无需他们准备，陪嫁则可多可少，女儿结婚在形式上仍然是“出嫁”，而男方在形式上则仍然是“娶媳妇”，即使婚后新人并不与男方父母同住。这些地方都是老传统的曲折映现，深刻地反映出，在今日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男女地位高下主次的传统还是被无形地恪守着，女方在实际上仍处于从属地位。

婚礼前，现在风行拍婚纱照，这也是一种时尚。此中婚纱照，往往要拍成一组，大大小小装满一本相册，并要放大一张最大的，以便装入镜框置于卧室。这批照片将是这对新人永久的纪念，所以他们不惜花费昂贵的代价，拱手将丰厚的利润奉送给照相馆（为此可能花费三、五千元，甚至上万元）。顾名思义，婚纱照当然要穿上婚纱，婚纱既可自备，亦可向照相馆租借。拍摄前会有人帮新娘化妆穿衣，摄影师则会帮助新婚男女摆出各种姿势，既显示他们的美丽，又表现他们爱情的浪漫，不过由于过分地美化，有时反而失真了。

至于婚礼，今日的时尚是要租用酒店的大厅举行仪式，时间一般是从傍晚开始。当日自要广邀亲朋好友，摆开酒席，婚礼就在席间举行。整个婚礼事务一般由专门的婚庆公司承包，婚庆公司是早先三百六十行以外的新行当新产业。这种公司人数往往很少，许多事务需要与别的行当（如出租汽车、鲜花店等）协作，但由此公司主持。他们要负责布置礼堂，安排程序，并派车迎接新娘到饭店，事后送新人回家。汽车的档次也呈日渐增高的趋势，像加长的凯迪拉克、劳斯莱斯或林肯、奔驰等等较受欢迎，即使租金高昂也供不应求，遇到公认的好日子，可以说是一车难订。汽车上的鲜花装饰则归婚庆公司负责。

新式婚礼上最重要的要算司仪，或称主持人。整个婚仪的隆重活跃与否，全在此人掌控调节之中，故他必须口齿清晰、语言流利，最好能会一点英语；还要善于察颜观色，掌握节奏和分寸；如果能够幽默诙谐，随机插科打诨则更佳。此人是婚庆公司的重要成员，但也可客串担任。这种有司仪主持的婚礼，在上海有日益普及之势，婚礼司仪已成为一种时尚职业，与婚庆公司的发展都处于上升态势。

V 结 语

上海，由于它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发展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半殖民地的经历，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所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形成的文化，有研究者把它概括为都市化、多元化和两重性等基本特点^①。这当然是符合上海文化实际的。现在，根据我们对上海都市民俗的研究，似乎还可作出某些补充。

第一点补充，就是要强调上海文化强大的创新性。这种创新特征鲜明地表现在民俗生活中时尚对传统的消解覆盖、吸收融合和取代改造上。前文所述关于住房的种种旧习新风，既说明传统的顽强（如关于住房地段的等级观念），也说明随着客观状况的变化，旧观念在被迅速地消解和淡化——对浦东住房的时尚追求，就证明了这一点。前述关于信仰和节日风俗的描述，则更多地说明时尚与传统的融合。其实传统与时尚本来就非截然对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能够相互转化的。时尚一定要流行甚至风靡，否则便谈不上是时尚，而时尚又往往失落在流行与风靡之中。为什么？因为所谓流行和风靡，乃是不断地、大规模地模仿和复制，久而久之，那被模仿和复制的时尚便抗拒了时间的流

^① 如陈伯海在《上海文化通史·引言》中说：“从上海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它自身的一些总合性特点，那便是都市化、多元化和两重性。”见该书7-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逝性而积淀下来，对于后人来说，它也就成了一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新的时尚面前，却又难免岑寂下去，甚至一度会销声匿迹，成为一股潜流。但到了某种时刻，遇到某种契机，它又可能东山再起，稍经变化，成为新的时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唐装和喇叭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竟然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服装，风行了一阵，其声势才被新的服饰所代替。时尚与传统就这样融合着，但需要说明的是时尚总是处于活跃的主动地位，处于引领和向导的地位。在前文对上海婚俗时尚的叙述中，新时尚改造和取代旧传统的趋势，也是十分清楚的。创新，创新，永远不断地创新，这正是上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民俗时尚和传统的张力关系中，也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第二点，与上有关，是上海文化的开放性。上海文化超强的创新性，来源于它的开放性。真正具有创造力的是人，如果上海不是吸引了全国英才乃至世界英才，如果上海还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封闭，上海文化的创新能力是不可能如今日般强大的。开放与创新，闭关与守旧，是拆不开的孪生兄弟。

由上述两点，也就必然带来第三点，多元文化的互补性；第四点，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这两点意思明白，无需解释。

创新、开放、多元互补和极其丰富，这便是我们通过对上海都市民俗部分内容的研究分析，所得出的对当前上海文化基本特征的认识。上海文化曾经有过它的辉煌，也曾经有过岑寂和低落；上海文化有它的优越之处，也有它的弊病和不足。但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上海文化是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

参考文献

- (1)唐振常主编. 上海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 (2)陈伯海主编. 上海文化通史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 (3)蔡丰明. 上海都市民俗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4)程蔷、董乃斌. 唐帝国的精神文明 (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
- (5)程蔷. “过年”: 从传统到现代——并略及中日过年习俗异同的比较 (J). 日本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开发研究科 GSID Discussion Paper No. 128. 2004. 28.
- (6)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民俗文化 (论文集) (Z). 2001. 293.